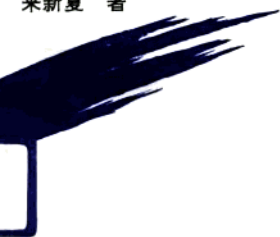


七十年前他兴冲地赶到
 越南场历经名师点化怎
 奈智商不偶读书千卷求
 玄解行路万里出过浮侧
 身难舍误人子手使难修
 著书三十种撰文百什篇那
 有什么新花样官居品外尸
 位教年名登群书不脱皇
 宵满暗箭痕痕背有拂刀
 创伤无爱无怨意乞坦居
 蒲伏默祷合上七卷只要
 不死台陴还要再上

志域探步

来新夏 著





七十自贊

七十年前

他與中工地趕到熱鬧場

[illegible]

台阶还要再上

一九九三年五月于德谷
时年方七十

自序

1923年夏,我出生在杭州一个家道中落的知识分子大家庭中。祖父来裕恂是本地颇有名声的学者和诗人。光绪末年,他以秀才身份参加过光复会,又到日本弘文书院学过教育;辛亥革命后在本省从事教育工作。祖父也是一位地方志专家。有一段时期,他几乎以修志为主要生活来源。1948年,他在极艰难的条件下,独立完成了本县最后一部民国志书——《萧山县志稿》的编纂工作。我的童年是依傍在祖父膝前度过的。祖父是我的启蒙老师,使我幼小的心灵中早早地对地方志产生了印象。

1942年,我经历了小学、中学而进入了北平辅仁大学,由于专业需要和藏书便利,我阅读了若干种县志,得识其体例,还通读过历次所修萧山县志,并撰有《萧山志要读后》刊于报端。

解放后,我从事史学研究,曾利用地方志资料撰成《试论清光绪末年的广西农民大起义》(《历史研究》1957年11月号),并投入编写“四史”的活动。

六十年代,在参加“四清”之际,我曾写过《丰润县志》片断、霸县《东台山志》和盐山《南阡志》。可惜这些手稿多

已散失不全。这期间我又曾应倡导编史修志的梁寒冰同志嘱托,拟定编志草案,其中有访求地方人士参加修志的主张,不幸成为“文化大革命”中批我的第一张大字报的主要内容。开始我未能“认罪”,后来才渐渐明白我犯了“举逸民”的“罪行”。

凶凶倾覆,朝晖重现,修志工作又得复苏,寒冰同志壮心未已,再倡盛举。1980年天津召开中国地方史志协会预备会,我奉命作《总结旧志,创编新志》发言,进而撰成《略论地方志的研究状况与趋势》(《天津社会科学》1981年创刊号)。这是恢复修志工作后我的第一篇成文;后经日邦学人东北大学寺田隆信译为日文刊于《东洋史论集》(1984年第一辑)。次年8月,中国地方史志协会成立于太原晋祠,我不仅躬逢其盛,复膺理事职任。而八所高校合撰教本,又谬推总领其事。历时年余,乃成《方志学概论》一书(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年),为海内史志贤达所注目。

我上承祖业,时逢盛世,益感振奋。1982年全年仆仆于苏、晋、鄂、冀培训修志人才。1983年故乡萧山重命为县志顾问。1984年受任旧志整理委员会委员,又以寄籍天津忝列天津史志编委一席。1985年,中国地方志协会包头集会又蝉联理事。九十年代前后,各地县、市志陆续杀青,我应邀担任了若干县、市志的志书顾问,写了一些表达我看法的序言和评论。1991年,我有幸与日本独协大学齐藤博教授就中日地方志比较研究问题进行合作。在我们共同主持下邀约了第一流学者分别完成了各自的研究论文并汇成《中日地方志比较研究论文集》出版。我

首先落实了地方志进行国际交流合作的研究工作。我虽立志继续奋进,但志域宏阔,而我则学识浅陋,临深履薄,探步而前,犹虞有失。老骥“出”杨,志在“万”里,行当以此自勉于史志事业,并呈历年探步所得于同道,声应气求,实企翘盼!

1993年春节重写于莲谷
时方古稀

目 录

自序	(1)
上编	(1)
第一篇 丰富的历史遗产	(3)
一、清前的志书	(3)
二、清代修志事业的成就	(8)
三、民国的志书编写与研究	(17)
四、历代方志学的研究	(18)
第二篇 建国以来地方志的编写与研究	(24)
一、整理旧志	(24)
二、方志与方志学的研究	(32)
三、创编新志	(37)
四、今后的趋势	(41)
第三篇 新编地方志的取材	(46)
一、旧志资料的批判与继承	(46)
二、旧志经济资料初检举例	(51)
三、资料的搜集、整理与利用	(57)
第四篇 新编地方志的编写	(74)
一、地方志的编纂体例	(74)
二、正确处理编写工作中的若干关系问题	(77)
三、地方志与文史资料	(87)
四、回顾与前瞻	(92)
第五篇 审稿与评志	(101)
一、加强新编地方志的审评工作	(101)

二、审稿的四项标准	(104)
三、对几部新志的评论	(111)
(一)对萧山、渭南、玉山三志的评论	(111)
(二)《江宁县志》小议	(120)
(三)再读《青州市志》	(126)
(四)《常熟市志》读后一得	(131)
(五)读《青田县志》	(134)
(六)喜读《江阴市志》	(136)
四、新志评论提倡多种形式	(142)
第六篇 开拓史志编写领域	(146)
一、企业史志的传统	(146)
二、新兴企业的史志编写	(149)
第七篇 近代地方文献学家陈作霖	(154)
下编	(161)
一、重印《畿辅通志》前言	(163)
二、《萧山县志》序	(172)
三、《萧山县志稿》说明	(177)
四、《青州市志》序	(183)
五、《盐山县志》序	(185)
六、《鄱陵县志》序	(188)
七、《蓟县志》序	(191)
八、《许昌市志》序	(195)
九、《许昌县志》序	(198)
十、《项城县志》序	(201)
十一、《克什克腾旗志》序	(204)
十二、《广陵区志》序	(207)

十三、《石家庄地方史志研究丛书》总序	(210)
十四、《天津风土丛书》总序	(213)
十五、《徐州地方志通考》序	(215)
十六、《河北地方志提要》序	(218)
十七、《教育志学》序	(222)
十八、题《滨久文集》	(224)
后记	(226)

上 编

第一篇 丰富的历史遗产

中国地方志具有悠久的历史传统。它是记载某一地区自然、历史、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纵横各方面的情况和资料的一种著述体裁；是对地方情况进行综合性反映的百科全书；是撰述历史借以取材的资料宝库之一；是华夏文化宝库中卷帙繁多、内容丰富的一块非常引人注目的瑰宝。回顾两千多年的方志发展史，不仅有大量的各类型志书，而且还开拓了方志学的研究领域，撰述了若干专著，流传给后世一份丰富而宝贵的历史遗产。

一、清前的志书

中国地方志的起源很早，但古今学者对此众说纷纭，迄今还无定论。《禹贡》、《周官》、《山海经》、《越绝书》、《吴越春秋》、《华阳国志》等图籍曾被学者们分别引为方志渊源，这些观点是有一定理由的，但是并不全面。因为一种体裁、一类图书在它形成过程中，都是从多方面汲取源泉，逐步发展、丰富、演化而来。方志也不例外，决不能只是一个来源，但也不能说在方志发展历程中对

其有所影响者均可视作起源。方志应是在兼收国别史、地理书和地图等各种不同源泉的基础上，逐渐发展融合而成为一种新的反映地区特色的体裁。不论如何，将方志起源推溯到战国时期，基本上是没有太大争议的。我们如从战国时期算起，至今已有二千余年的历史，真可谓源远流长。

中国地方志在延续二千多年这样一个长时期内是从未间断的。1973年马王堆出土的汉初地形图、驻军图和城邑图，当为现存最早的图经雏型；不过当时还侧重在地理方面。到东汉袁康等所撰的《越绝书》，就多记及人事活动，兼具了史、志的规模。魏晋以来，方志的编纂体制渐臻完备，不仅有图文并存的图经，而且还有分类分科的专著，如晋常璩的《华阳国志》和梁宗懔的《荆楚岁时记》等，都是当时的方志名作，前者综述蜀地情况，后者专记荆楚风俗，已呈方志综合与专科的分野之势。隋唐之时，方志编纂工作开始受到政府的注意。隋大业年间，“普诏天下诸郡条其风俗、物产、地图上于尚书”（《隋书·经籍志》）。这是国家明令修志的最早创意；是地方志由民间到官方、并作为国家政策来付之实行的一种重要发展。从此篇幅巨大的方志著作陆续出现，数量也有所增加。如见于《隋书·经籍志》著录的就有《诸郡土俗物产》151卷（唐时残存仅19卷）、《区宇图志》129卷、《诸州图经集》100卷等等。唐代方志著作尤多，如见于《旧唐书·经籍志》和《新唐书·艺文志》著录的就有《括地志》550卷、《元和郡县图志》40卷、《十道图》10卷等等。其中《元和郡县图志》是一部

由政府正式出面编纂而对后世颇具影响的著名方志。它记述了唐宪宗元和时十道所属州县的历史、疆界、山川、户口、贡赋、古迹等，南宋时图亡，即称《元和郡县志》。唐朝还建立了图经编造制度，唐德宗年间定五年一修图经，与户口、版籍同送中央政府（《唐会要》卷59）。据《太平寰宇记》及《太平御览》所征引，唐代至少有五十个州有图经。二十世纪初，在敦煌石窟发现唐代所修的《沙州都督府图经》和《西州图经》等多种卷子本地方志的残卷。这是现存最早的图经，虽原件已被劫掠至巴黎图书馆，但从《敦煌石窟遗书》所见收的残件上，还可看到早期方志的规模——即以图为主而附加文字说明。唐代方志门类较多，史评家刘知几在《史通》的《杂述》篇中曾细分史籍为十流，其中有郡书（如陈寿的《益都耆旧传》）、地理书（如常璩的《华阳国志》）和郡邑簿（如《三辅皇图》）等三类具有地方史志性质的图籍。这表明当时地方史、志的并存。

宋代，地方志的撰著日趋兴盛，著述体例逐步定型，门类渐广，内容也由以地理为主而兼及人事，长篇巨帙相继出现，除见于著录的《祥符州县图经》1566卷和《皇朝方域志》200卷等亡佚著作外，现存的宋代方志尚有《太平寰宇记》200卷（缺113—119卷，《古逸丛书》曾补入113—118卷，其中卷114不全）、《舆地纪胜》200卷和《方輿胜览》70卷等。这些著述不仅篇幅大，而且在编纂体制上也大大前进了一步。即以《太平寰宇记》而论，在地理之外，又编入姓氏、人物、风俗数门，详细地记录了人物的官爵、所撰诗词以及人事活

动,极大地丰富了地方志的内容,开后世地方志立人物、艺文体例之端。清代学者钱大昕曾评价《太平寰宇记》说:

“是书体例虽依吉甫(按:唐李吉甫曾主持《元和郡县图志》的编纂工作),而援引更为详审,间采稗官小说,亦惟信而有征者取之。有宋一代志輿地者,当以乐氏(按:乐史主纂《太平寰宇记》)为巨擘。”(《潜研堂集》)

至如宋敏求之《长安志》、《河南志》虽为学者推崇,以其可见图经向以文字为主过渡的端倪;但从数量上说,北宋以文字为主的方志尚不如图经之盛。直至南宋,图经趋衰,而以文字为主的志书日盛。有人据《中国古方志考》统计:北宋图经有 96 种,南宋仅有 31 种;北宋以文字为主的志书有 24 种,而南宋则增至 248 种;其不能确定为南宋或北宋者,有志 150 种,图经 92 种。今传宋代方志有 30 余种,南宋成志者达 27 种。

宋代,地方志的续修制度也开始建立,即以临安一地而言,就先后有孝宗乾道五年(1169 年)周淙一修《乾道临安志》、理宗淳祐十二年(1252 年)施谔再修《淳祐临安志》和度宗咸淳四年(1268 年)潜说友三修《咸淳临安志》。这三部书都有一定的水平,近来有学者推此三书“体茂事备,可称名著”(傅振伦:《从敦煌发现的图经谈方志的起源》,《兰州大学学报》1980 年第 2 期)。在前后一百年中,而且是处在一种兵马纷乱的动荡年代里,一个地区的地方志竟能重修三次,也可见方志修撰工作所受到的重视。

宋代修志数量有显著增加,据有关著作统计,宋代

修志近 800 种之多，现能见到的尚有 33 种。在正规志书之外，宋代的风土小志也很值得注意，如孟元老撰《东京梦华录》10 卷，记开封地方的风俗、人情、物产以至街头商业等情况甚详。他如《都城纪胜》、《梦粱录》和《武林旧事》等等也大多类此。这些小志反映了该地区的社会风貌，成为地方志的补充和支流。

元代创立了一统志形式，纂修了《大元大一统志》，开启了明清两代官修一统志的风气。今存的元代全国性志书尚有朱思本撰《九域志》残本与坊刻《元混一方輿胜览》二书；地方性志书有 170 种，传世者有 11 种，著名的有《至顺镇江志》和《齐乘》等书。

明朝从明太祖洪武三年开始即纂修全国性通志，先后有《大明志书》、《大明清类天文分野之书》、《寰宇记通衢书》等。成祖即位后，又诏修天下郡县志书，惜未成功。景帝于景泰七年继续完成《寰宇通志》。英宗复以《寰宇通志》繁简失宜、去取未当而于天顺五年修成《大明一统志》90 卷。至于地方修志更是相当普遍，据一种统计，现存明志有 992 种。明永乐十年（嘉靖四十年《寿昌县志》卷首）、十六年（正德《莘县志》）曾先后两次颁布修志条例，开始有了正式的政府修志法规，反映了政府对修志工作的极大重视。明朝还为重视边防而编写重要的关镇志，如《明史·艺文志》中就著录有刘效祖的《四镇三关志》（四镇指蓟州、真定、辽东、昌平，三关指居庸、紫荆、山海）和詹荣的《山海关志》等多种。

二、清代修志事业的成就

清代重视地方文献的最大成就约有二端：其一为嘉、道间盛行对边疆问题的研究，梁启超氏曾论其事说：“自乾隆后，边徼多事，嘉道间学者渐留意西北边新疆、青海、西藏、蒙古诸地理，而徐松、张穆、何秋涛最为名家。松有《西域水道记》、《汉书·西域传》补注、《新疆识略》，穆有《蒙古游牧记》，秋涛有《朔方备乘》。”（《清代学术概论》15）这一端导致了某些学者对边疆史和元史的研究而逐渐朝史的方向发展。其二为自清初发端至康乾称盛的修志事业。志书覆盖面之广，内容包罗之富，影响后世之巨，在地方文献研究领域中似已与边疆史的研究难分轻重，而朝志的方向发展。但其受重视的程度远逊前者，甚至有“不足以语于著作之林”之讥，是不可以不着重予以论述。

中国修志事业源远流长，它合国史、图经、地志、纪传诸体而独创一体，历代相承，至宋体制初备，明清有显著发展，而清则久为学者推重为方志编纂的鼎盛时期。鼎盛之称并非虚夸谬誉，究其成就，盛名可符。

中国方志为数甚多，据一种保守性的统计约有 8200 余种，而清代所修为 5701 种（《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占方志总数近 70%，其中康、乾两朝所修为 2551 种，又占清修方志的 44% 强，是清修志书在数量上之居于绝对优势已无疑义。

清代修志事业的成就不仅数量巨大，而且类型齐备。